

統計數據背後的打工妹

林宗弘

2005年7月，我隨當時任教於香港科大的潘毅教授與陳允中教授所組織的血汗工廠調查小組來到東莞的樟木頭，一個靠近山區的林業小鎮。就像中國其他的工業化地區，這裡的景觀充滿了矛盾的對比，一邊是人民公社時期保留下來的「土角厝」，另一邊是嶄新的港資企業廠房，生產印有迪士尼卡通人物的文具。這裡的工人一個月大概只能掙到五、六百人民幣，廠方包吃包住要扣一百五，飯菜的品質又極差，工人寧可搬出去住自己煮飯，因此，農村裡一套雙人床的破房間，房租每月一百塊仍床位難求。

傍晚，我們在一間農舍門口與三名來自四川的女工攀談，其中一位年輕打工妹用頗標準的普通話陳述她在廠裡的見聞。原來，一年多前東莞勞動局來此地查廠時，工廠為了應付勞動檢查合同造假，工人才知道廠方的低工資已經違反勞動法，憤而組織抗爭。資方花錢收買、開除了一部份帶頭罷工的生產線「老大」之後，終於暫時壓制了工潮。2005年5月起，勞動局要求廠方遵守最低工資，每月必須達到五百七「保底」的標準，資方反而變相提高保底的最低標準，做不完按未達標的件數扣錢。一位男工不滿地說，廠方這種作法逼工人超時趕工到半夜，與之前用加班工資的算法比較起來，保底件數提高，總收入反而降低，是「無薪加班」。

我們把話題轉向工傷，這是此次血汗工廠調查的重點。打工妹說，這間工廠六月底剛死了兩個工人，其中一個打工的男孩疑似感冒肺炎，領班不讓他休息，加班完隔天被發現死在床上，另一個打工妹連續加班沒睡覺，結果放假後意外死在廠外。廠方賠了一萬五給前一個農民工的家屬，後一個女工就只賠了六千塊。

當我們訪問這位打工妹時，屋裡另外兩位中年女工有一句沒一句補充著，一個照撫著屋內鍋裡的菜與開水，一個拿起掃把忙著打掃。不一會兒，她們便用四川腔熱情地招呼起來，「你們一定還沒吃晚飯，一起來吃吧！」「對啊，一塊兒吃！進來進來！別客氣！」我們跟進屋去，在潮濕陰暗的農舍裡架著三層床位以及一些簡單的家當，牆邊有張約一尺高，兩尺見方的小桌，上頭擺著她們三個女工的晚

餐：三碗白飯，一大盤炒了辣椒與花椒粉的空心菜，還有三大碗燒滾的白開水。

雖然菜香四逸，這真是令作為研究者——而且還是個前台灣工會工作人員的我，難以下嚥的一頓飯。當時我只能制止正在添飯的女工大姐，說我們不餓，真的不客氣，繼續聊吧，妳們快吃，吃完還要趕去上夜班，遲到要罰錢。

這趟暑假迪士尼工傷調查之旅，總共訪問了珠三角十餘家外資與台資工廠的農民工與打工妹，令我大開眼界，這些訪談後來由「大學師生監察無良企業行動」(Students and Scholars Against Corporate Misbehavior, SACOM)整理成《找回米奇的良心：迪士尼公司所屬中國製造廠商的勞工調查報告》公諸於世，串聯國際反血汗工廠的活動，該組織並獲暢銷雜誌《南風窗》選為中國年度公益社團。然而近三年後，迪士尼改善血汗工廠的承諾仍口惠而不實，多半被發現後抽單了事。

這次調查也讓我意識到社會學界市場轉型之爭的理論限制。中國市場轉型爭論的「政治資本」與「人力資本」的回報，能夠說明珠三角工廠裡數千萬民工所面臨的生活處境嗎？從人民公社到現代工廠的這三十年，究竟是何種力量塑造了當代中國的社會不平等？回頭來看，毛澤東統治時期的中國，在這種不平等的發展中是無辜的嗎？最後，台灣社會學者的研究是否總透過台資的視野或田野，把中國工廠當成台商研究的延伸？顯然，台商從來就不是共產黨統治下的弱者，毛澤東時代的舊體制也不是無辜的，眼前犧牲農民與工人的血汗工廠更不該被遺忘。很自然地，我回到馬克思的階級研究傳統、與毛澤東時代的幽暗歷史裡去找答案。

在香港科大的「中國社會分層」研究班上，我嘗試提出擴展新馬克思主義階級分析的初步構想，並獲得邊燕杰教授的鼓勵與支持，之後參與黃善國教授的分類數據統計課程，更重要的是吳曉剛教授亦師亦友的悉心指導，幫助我將中國社會正在「無產化」的感性直覺，逐漸轉化為學術規範下的量化分析。此外，科大社會科學部的中國大陸同學、與香港勞工 NGO 的友人們，給了我許多協助與關懷。如果沒有上述所有人的提攜，這篇文章不可能問世，當然，文中的分析與數據仍有許多令人不盡滿意之處，該由我自己負責。但是起心動念，在東莞樟木頭跟四川打工妹那一頓食不下嚥的晚餐，或許才是這趟學術之旅的出發點吧！